

前沿

The Frontier



Vol.03, 2013.12
CFAUMUNA Presents

前沿

The Frontier

2013年12月上 总第03期

Vol. 03 December 2013

总主编：黄启凡
副主编：赵觉理
周楠
责任编辑：杨程程
策划：闵悦
顾问：黎毓珊
刘楚然

官方网站：<http://i.cfaumun.org>

特别感谢所有参加杂志投稿、制作的作者和编辑人员。

本刊为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内部刊物，立场中立，所有文章仅为作者态度，均不代表本刊观点。

投稿及一般性问题咨询，请联系 frontier@cfaumun.org

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 荣誉出品

卷首语

成长·满足·幸福

曾经无数次想为自己的模联经历写下点什么，可无奈，每届模联大会结束后接踵而来的就是下一次大会的筹办，循环往复，总是很难找到某个契机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回顾。不曾想，真正离开这个社团后，却更加不舍得写下只言片语，仿佛写下这最后的总结就意味着终于要彻底与这个社团、这群人告别了。所以非常感谢《前沿》，能够让我以卷首语的形式送给这个社团最后一份礼物，也为自己的模联生涯画下一个句号。

外院模联，这四个字于我而言有着沉甸甸的重量。从大一到研一，我在外交学院的六年时间里，她陪伴了我整整五个春夏秋冬。期间，我从大会志愿者一步步成长为秘书长，我从一届又一届大会的成功举办中体会到了学生时代社团活动能够带来的最大满足感，我从来来去去的各位协会成员与志愿者身上得到了最大的幸福感。进入模联协会纯属偶然，但我现在却已经无法想象如果从一开始没有这个意外，我的大学生生活会是什么样的，而现在的我又会是谁。

成长。在外院模联的这五年里，我与她一同见证着自己的每一步成长。从志愿者到秘书长，我就像从一颗弱不禁风的小树苗终于成长为能够为全协会提供荫蔽的参天大树，前一年的棘手难题，到后一年就变得手到擒来，一点一滴地积累经验，直到最后能够解决协会遇到的所有问题并对整个协会负责。在外院模联的磨练中，我一点点变得更好更优秀，没有她，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满足。每一次会议的举办都能带给我最大的满足，充实我的整个学生生涯。从最初的会议预想到最后闭幕式上敲下的那一记锤响，每一个细节都包含着整个协会所有人的心血与汗水。所以当这份承载着集体智慧与力量的艺术品终于揭下面纱，呈现在世人面前时，我都会为这个过程而感动、满足，无关褒贬。

幸福。外院模联协会是我永远幸福的港湾。在这里，有为我的工作失误承担责任的学长学姐，有与我一同熬夜工作的同学挚友，更有不顾一切支持我工作的学弟学妹们。在这里，深夜发出的邮件能在几秒钟后得到回复，会议筹备过程中的一切委屈与困难都有无数个“我懂”和“我帮你”，而会议结束后的如释重负与满足感更是化作了一个个用力的拥抱。在这里，我学会一笔一画地写下“幸福”这两个字，送给自己和每一位协会成员。

曾有人说：“自我成长的坚持无关逼迫和制度，那是一种内心蓬勃向上的喜悦，即便缓

慢即便细碎，你还是听得见从蜷缩到伸张的声音。那种窃喜、惶恐、知足和敬畏的感觉，让你不忍停下，继续与时间赛跑。”从2001年至今，外院模联协会经历的就是这样一种成长的过程，而她带给协会成员的成长也正是如此。希望外院模联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自我成长，希望外院模联人能够永不停止前进的脚步，也希望我能够永远为这个社团而骄傲！

崔璐

前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 会长
2012 北京模拟联合国大会 秘书长

2013 年 12 月 4 日

目录

民主国家是否比非民主国家本质上更热爱和平?	张思南	1
Education, the Real Engine that Pushes Gender Equality	Zihao Huang	6
中国不结盟政策再思考	赵觉理	9
近年法国对外贸易情况浅析及法中贸易形势展望	杨程程	14
Dans la région arctique, cherchons la solution des conflits régionaux sous la globalisation	Tong Hu	20
浅谈政治学背景下的模联学术问题	左锦涛	24

民主国家是否比非民主国家本质上更热爱和平？

张思南

自由主义认为，通过代表并贯彻人民的意志，民主政府可以将民众热爱和平的天性融于其国家性格之中，实现民主治下的和平，其内涵包括民主国家阵营内部及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和平关系。¹ 二战后民主国家阵营内部长久的“民主和平”² 和冷战的和平终结均证明了这一论断，民主国家更倾向于采用温和的手段，而非战争去解决国际争端。但是深入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不难发现，民主治下的和平只是表象，本质上民主国家并不缺乏战争基因，这一战争基因甚至在现代社会借“全球民主化”的大旗卷土重来。

一、民主治下的和平

自由主义认为，战争源于极权政府的强制权力，并非民众的意志，而民主政体的本质使得这种强制力不复存在。康德曾言，在一个政体为共和制，统治者对民众负责，个人权利被尊重的社会里，战争的最终决定权在普通民众手里。³ 在遵循民众意志的国家中，人类爱好和平的天性及对战争危害的恐惧往往会在国家性格中得到体现。

康德的这一论断并非空穴来风，战后民主国家间的“民主和平”与冷战的和平终结均证明了这一点。根据自由主义观点，相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可以避免战争的产生，因为任何坚信民主代议制是唯一道德且合理的统治途径的国家是不会挑战其他采纳相同统治途径的政府及其合法性的，面对争端，民主国家更倾向于使用诉诸协商妥协，而非战争。斯科特·布尔切曾道，“民主国家间和平的意愿与能力是独一无二的”。历史诚然展现了民主国家热爱和平的一面：从1946年到1986年间，没有一场严格意义上的战争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

“在这40年间，任意两个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概略为二百七十六分之一，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个概率在任意两个不都是民主政体国家之间则会翻八倍升至三十六分之一。”⁴

同时，从“铁幕”正式落下到冷战结束，民主阵营保持着高度的理智，在“民主和平”⁵ 的基础上与苏联极其卫星国保持冷静克制又不失锋芒的军备竞赛。其核心美国即使在面临古巴导弹危机时，也没有选择发起战争。最终，冷战已令人欣喜的和平方式宣告终结，民主国

1 Jaylis Baylis, Steve Smith, and Patricia Owen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Scott Burchill,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05.

3 Immanuel Kant, *Kant's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4 Russett Bruce, *The Fact of Democratic Pea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81.

5 Scott Burchill,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05.

家对战争的冷静克制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结果和平”而非“本质和平”

然而，自由主义描绘的民主治下的和平并非源于民主制度本身，其产生实为民主国家对上世纪以来冷战均势格局以及全球化下的经济相依的应激反应，属于“结果和平”而非“本质和平”。

第一，在斯科特·布尔切重点关注的 1946 至 1986 四十年间，所有的主要民主国家之间都维持着和平关系，但从冷战均势格局角度，不难发现这些国家都面临着华约西侵的威胁，“民主和平”实质上是出于制衡苏联需求的内部纪律：一方面，苏联威胁的阴影迫使主要民主国家自律团结在一起，通过联合以期自保；另一方面，美国作为民主阵营的核心与领袖，面对无法独自抗衡的苏联，建立了维护阵营内部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秩序，以他律强化了民主国家间的自律。由此，“民主和平”是冷战均势格局的结果，而不是民主政体的本质使然。

第二，战后自由贸易逐步在全球建立了强大的经济相依，产生了一种建立在共赢基础上的和平。复杂的国际经济纽带确保了没有国家可以肆意妄为，而又不受到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经济制裁；同时，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通过强权威胁其经济合作对象都是愚蠢的，因为后者的市场和资本往往对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马歇尔计划、欧洲经济一体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确立产生一种强大的外力，推动和平合作成为符合国家利益的选择。虽产生于民主国家阵营内部，但经济相依的外力所孕育的和平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凭借经济体系的内在力量逐步传播至非民主国家，缔造了影响力空前的国际和平。前南斯拉夫和前捷克斯洛伐克都曾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重要成员，与西方民主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由于自由贸易的平台长期由民主国家主导，经济相依作用下的“民主与民主国家、非民主与非民主国家、民主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和平”常被世人误解为民主治下的和平。但实际上，这一国际和平是全球经济相依的结果，而非民主制度带来的福音。

第三，而在与非民主国家的关系上，冷战的和平终结为民主国家赢得了爱好和平的美名，但与其说是民主国家造就了战后的和平，不如说战后的国际新格局成就了民主国家的声誉。诚然，历史上民主国家选择了“和平演变”，但从其内在原因分析，不难发现，这一结果是对均势与全球化经济相依的被迫反应。对于民主国家而言，如果对前苏联及其卫星国采用强硬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可能带来结果不可承受的核战争和严重的经济损失，其放弃战争的原因是过高的风险，而非民主政体的本质。但当战争代价处在民主国家接受范围内时，民主国家从不介意使用战争来解决与非民主国家的国际争端。冷战期间，美国先后入侵了希腊、

朝鲜、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古巴、越南、老挝、多米尼加、黎巴嫩、巴拿马等与其国力、军力对比悬殊的国家。

三、民主国家的战争基因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民主政体下，民众往往更青睐战争，民主政府也因而比非民主政府更富侵略性。自由主义认为，在趋利避害和厌恶战争的人性作用下，民主国家的民众会理性地避免选择发动战争，使用妥协协商来解决国家间争端。这一推论局限于战争导致的灾难，却忽略了战争获胜方可能获得的巨大利益；同时，它仅关注人性“避害”的一面，却忽略了人性“趋利”的自然追求。自由主义忽视了一个巨大的不同点：对于非民主国家而言，无论战争胜负情况，其民众往往都要承担战争的负担¹；但对于民主国家，其民众并不仅是战争的受害者，也是战争的获益者。理论上，民主政体中统治阶级是人民大众本身，民众所参与的任何由统治者发动的战争都是为自己而战，所攫取的战争利益也归于他们。在战争利益显著的情况下，民主国家的人民非但不讨厌战争，反而会积极参与，具有不亚于极权国家统治者的好胃口。在现代社会，受制于国际新格局的民主国家并未显现其战争基因，但如果追溯到近代乃至古代，民主政体“战争催化剂”的特质便显而易见。在近代，英国的海外扩张为其国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催生了民众对于帝国主义扩张的巨大热忱，这一狂热在民主政治体制影响下植根于大英帝国的国家性格：1872年英国前首相迪斯雷利发表著名的水晶宫讲话，公然宣称大英帝国的对外政策应着眼于世界支配。在古代，纵观整个古罗马历史，共和国时期的罗马公民比任何其他年代的罗马人都更好战，因为他们是罗马军团的核心，也是对外征服掠夺的直接受益者；在雅典城邦，参与公民大会的雅典公民从来不缺乏支持对外扩张议案的热情与决心，其源源不断的战争决议无疑是很好的例证。

自由主义推论的另一不足就在于忽视了民主国家中民众作为战争决定主体本身的性质——由于认知的局限以及民众社会心理的因素，他们极易受到各种突发或有计划的社会因素影响，未必能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冷静的保持对战争的厌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民主国家的民众并不理性。即便结果得不偿失，民众也不能理性地拒绝战争，他们很容易被历史仇恨和野心家的花言巧语迷惑。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普法战争失败带来的复仇主义长期弥漫于法国民众之中，影响法国政坛直至1921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就是通过标准的民主选举上台的，那一代德国民众必须为他们民主通过的侵略战争负责。历史的悲剧在于，普通人往往缺乏看清全局的足够信息，致使他们无法进行理性决断，最终做出冲动的决定。“CNN效应”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1993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CNN）对索马里人权状况有失公允的夸张报道激起了美国人民对于索马里政府的强烈不满，愤怒的民意绑架了政府，最终推动了一系列针对

¹ Scott Burchill,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12.

索马里的失败的军事干涉。

与之相对应的是，非民主国家在战争抉择上要更加理性与谨慎。极权政府对信息的垄断使得统治阶级通常而言拥有足够的信息进行充分的利益权衡，他们必须在确保战争不会威胁到其威权统治基础之上考虑各方面因素，做出最理性的决断。显而易见，战争带来的持续伤亡、物资消耗、生活水平下降乃至潜在的战败会使得民众更加仇视他们的统治。沙俄皇室正是在一战引起的民愤中丢掉了权力，最终被悉数处决。

四. 神圣使命下的战争必然

民主国通过“和平演变”获得了冷战的胜利，实现了民主制度的“历史的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更加和平，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愿去侵略。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民主国家对其所采纳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感强化民主国家发动战争的可能性。

当今世界，尤其是在民主国家，民主制度被认为是道德、文明、理想的政体，而极权主义则是不道德、不文明、不可接受的历史糟粕。民主国家实际上并不将非民主国家置于威斯特法利亚框架之内，非民主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及其主权鲜会得到民主国家的尊重。更有甚者，在国际社会中，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民主国家有一种向非民主国家传播民主制度的使命感，因为他们坚信他们是在“为了全人类的幸福改正错误”。意识形态的优越感为各种形式的侵略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基础。面对不配合的非民主国家，尤其是国力衰弱的，满怀“现代十字军”狂热的民主国家从不介意使用武力。1989年美军入侵巴拿马就被美国视为“推动巴拿马民主化进程”。而且这种战争已然被神圣化，甚至不再仅仅是为了推翻非民主政府的统治，而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和天赋人权。

诚然，从历史的表象来看，民主国家偏向于以温和的“和平演变”去打击对立的非民主国家。但即便对于“和平演变”而言，美国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在其对拉丁美洲国家外交官的演讲中曾道，“阻碍和平变革的人将迎来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真正重要的不是“和平”，而是“演变”，摧毁非民主政府以建立民主制度的“演变”。更有甚者，在这场意识形态战争中，民主国家没有妥协、让步的余地，为传播“正确”的意识形态，侵略势在必行：非民主国家的妥协是一种进步，而民主国家的后撤则被视为不可接受，无疑回旋余地有限的民主国家很有可能在推广民主制度的过程中陷入战争的泥潭。

五、结论

自由主义坚信民主制度爱好和平的天性，甚至视其为消除战争的灵丹妙药。民主治下

的和平无疑从侧面坚定了他们的这一论断。但以国际视角观察，始于上世纪的“民主和平”与冷战的相对平缓局势实为民主国家对冷战均势格局和全球化发展下经济相依的反应，是一种“结果和平”，而非“本质和平”。事实是，真实的人性并不厌恶战争，直至近代，民主制度还扮演着战争催化剂的角色。而在今天，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民主制度占据道德制高点，民主国家的战争基因在全球民主化的“新十字军圣战”上卷土重来，并以“推动民主化进程”的新形式变得愈发无所顾忌。

参考文献

1. Jaylis Baylis, Steve Smith, and Patricia Owen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Russett Bruce, *The Fact of Democratic Pea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3. Scott Burchill,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4. Immanuel Kant, *Kant's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5. Oliver Ramsbotham and Tom Woodhous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onflict: a Reconceptual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6. John F. Kennedy, *Remarks on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Washington D.C., U.S.A., 1962.
7. Herfried Münkler, *Empir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8. Wolfgang Schivelbusch, *The Culture of Defeat: On National Trauma, Mourning, and Recovery*, Granta Books, 2004.
9.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古斯塔夫·勒庞，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1月。

* 张思南是外交学院英语系大四的学生，他是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的副秘书长。

Education, the Real Engine that Pushes Gender Equality

Zihao Huang

Before we start anything, I'd like to make some clarifications. The gender equality society here should be an equally treated society for men and women to live in. It's not giving any gender an upper hand or predominant power but simply recognizing them as equal beings of the society, giving them equal opportunities and access to resources while also admitting their differences as different individuals. There should not be any preference being given and meritocracy should still be the rule of the game but gender equality is here to make up those deficits we have created for our female counterparts.

We can perceive one thing in the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 that achieving universal primary education was one of the goals on the list. MDGs, as the first plan for the whole human beings' development, have granted education with a high position because it's fundamental and greatly influential in all aspects. We all know how education can be a key factor to many aspects such as tackling the poverty, but here I'd like to argue to you why education is going to be the real and sole engine that pushes women's status and rights forward.

Firstly, education is going to change the public opinion in the long run. The lessons or courses that are delivered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ill not only be simply full of knowledge and facts but also full of the conception of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is where we build the concepts of the world, the common sense to the kids and we must build them right. It's like equippi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with the idea of gender equality, letting the boys know that girls are of their equal position and letting the girls know that they could be just as good as the boys given the chance. Hence, with the proper form of education, which is a curriculum that does not only deliver knowledge but also the 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 These boys and girls are and will be the future makeups of the society and they're well aware of gender equality, which gives a favorable social environment for women's political empowerment through civil movement and lastly, in legislation when the moment comes.

Secondly, economically speaking, women who suffer from bad social status are due to the lack of economic productivity or expertise, which in turn hinders their decision making power and their leverage when they try to argue and fight for themselves. And this creates a vicious circle that could only be broken by education. Reasons are as follows, achieving the goal of universal education, despite the gender, will definitely enhance the women's capacity, if not expertise, on all sorts of fields, which could also prepare the women for the moment of equal opportunity and political empowerment. What's more, because the education gives them the knowledge or skills they need, they will firstly be able to feed themselves without depending on men and they can really show their real talents to the men if chances are given, so that some stereotypes that reckon women as somewhat inferior to men will surely be crashed. This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effect on countries with a strong men-centered society because the economic power could be translated into political power, which might break the deadlock of women being discriminated against. What's more, this also helps to ensure the proper education mentioned above, the one that includes the gender equality concept could be well deployed.

Thirdly, education is not an exclusive thing for kids but a life-long commodity for everyone now in the society as well. This kind of education, which includes the 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a lecture in the classroom. It could be carried out in forms of social campaigns and activities. But who is to carry out all these works will be a crucial part for the progress of gender equality. From my perspective, men should be the breach for gender equality to prosper and grow, because once there're men who believe gender equality, they will be great channels to advocate the gender equality; then, there will be more people believing in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merits of it. As for women, they will definitely be willingly leading the charge in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Every movement needs good leadership, but good leadership comes from proper education. For example, college student leaders led almost all of the civil movements that happened back in the 1960s. Therefore, we start here with the boost of the education, and a proper leadership of women will be at hand and it will take the gender quality progress further than ever.

All that I'm trying to argue with you is that education can boost gender equality in almost every country despite their circumstances of gender equality. For the poor countries, equipping the women with more knowledge and skills gives the whole

country a chance to live a better life and better their status in the future.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education gives the female members more initiatives and leverage to fight for their equal opportunities because the education they receive gives them the power and say, which will in turn help their countries move forward as well. As for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gender equality has been basically achieved from where I stand. Education changes fates, and it changes the landscape of gender equality.

**Zihao Huang is a junior student majoring in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He is a director of the Model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中国不结盟政策再思考

赵觉理

近年来，中国已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了自己的航母辽宁号，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外交方面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预测中国在即将到来的 10-20 年中不仅会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在军事、科技等方面也会和美国平起平坐，发展为一个作为新“极”出现的超级大国。与此同时，中国作为“预备役”的超级大国，应该放弃一直坚持的不结盟政策，转而效仿苏联与美国，开始广泛地寻找盟友，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新联盟，俄罗斯、巴基斯坦、中亚诸国以及东南亚诸国都被视为是中国潜在的盟友。

十八大之后，随着中俄关系更加紧密，习李相继对东南亚的访问以及“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给了结盟支持者们似乎强有力的论据。那么，不结盟政策究竟是否还要继续坚持？

本文将结合中国不结盟政策的历史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根据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形势解释中国是否还需要坚持不结盟政策。

在追溯历史之前，需要先明确两个概念。

首先，对联盟的定义对接下来的论述有着基础性的作用。联盟的原义应当是指国家或国家集团间在安全领域的联合。50 年代的中苏同盟，二战之后美国与日本、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的联盟，都是建立在集体安全的基础上。随着联盟的发展，和安全领域合作的外溢，许多联盟成为了涵盖经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共同体，其代表就是欧盟。但毕竟欧盟只有一个，而更多的、传统意义上的同盟依然是一种保障安全的方式，是一种国家应对增加或潜在的安全压力的重要办法。因此，笔者在本文内将联盟定义为“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为了国家安全而缔结的相互进行军事援助的协定”。

其次，还需要对不结盟运动与不结盟政策做一个简单的区分。

不结盟运动是指 1961 年开始，以铁托、纳赛尔、尼赫鲁为主要发起者，在贝尔格莱德成立的一个松散的国际组织。不结盟运动主要宗旨在于不与美、苏任一国家结盟，支持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支持各国经济与文化发展。学界也通常认为不结盟运动是第三世界国家为了争取独立自主、反对殖民主义与霸权主义的一场政治运动。

不结盟政策是指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为核心，实行的不与任何国家结盟的外交政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不结盟运动对中国的不结盟政策确实有借鉴意义，但是在内容上有本质区别。

众所周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就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新中国签订的最重要的盟约。条约第一条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第三条规定“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对于两国的关系，斯大林是这样说的：“我们当然要给予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若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也取得胜利，我们两国走一条道路，那么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就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发事件的威胁，因此，我们要不惜人力和财力援助中国共产党人。”在两极格局下，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选择与苏联联盟，几乎是当时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在度过短暂的蜜月期之后，60 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同盟关系名存实亡。而文革时期的动乱也使得中国的外交一度陷入困境。70 年代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后，中国事实上依然在用一种结盟的思想应对两极格局的压力。从联苏抗美，到联美抗苏，中国用一种“准结盟”的方式与美国应对强势的苏联。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政坛不稳，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强势出击，使得美苏之间又回到了一种力量平衡。恰逢此时，中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下开始改革开放，不结盟政策也应运而生。

在邓小平时代提出的不结盟政策，与中国一直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脱不开关系的。邓小平曾说过：“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结盟运动。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可以说，最初的不结盟政策就是源自独立自主。

之后，1986 年的政府报告中写道：“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绝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者建立战略关系。”十四大报告指出：“中国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随着不结盟外交的逐渐明确，不结盟成为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主要手段。

在两极格局中与超级大国结盟，意味着中国将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苏联的附庸，这与中国

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相悖的。但如果仅仅认为中国是在 80 年代借机希望摆脱苏联的控制，从而获得完全的自主权，这就太过于肤浅了。外交服务于内政，不结盟政策的产生一方面要回顾当时的国际局势，另一方面也要从国内因素寻找原因。

1978 年以来，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核心战略，而经济发展也成为了重中之重。因此，中国的外交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经济发展创设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亚非拉的民族独立基本完成，世界各地战争爆发的频率也日益减少，国际社会处在一个平稳期。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认识也从与之前的“与帝国主义一战在所难免”，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题”。美苏的威胁都不再令中国寝食难安，拥有了核武器也让中国有了保护自己的砝码，联盟对中国而言已经不是一种必要的选择。在以安全作为国家基本利益的前提下，结盟是被迫的（对中苏同盟而言有意识形态因素）。如果不是为了应对可能的安全威胁，没有国家愿意付出高昂的结盟成本。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经济发展取代保障安全成为第一要务，放弃结盟成为了一种正常的选择。

根据联盟的定义，尤其是中苏的同盟条约，结盟本身就对敌人存在一种预设。也就是说，联盟一定有一个潜在的敌人，在它的威胁下联盟才得以成立并维持。但对寻求良好国际环境的中国而言，联盟所固有的针对性不利于与广大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因此，选择不结盟外交，就意味着中国坚持一种非敌对的外交政策。中国不结盟，不联合一些国家去反对另一些国家，使得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不树敌，不对抗，让中国能够摆脱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的敌对倾向，不论姓资姓社，不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努力与广大国家发展外交关系。

不结盟政策实施之后，伙伴关系取代了原有的结盟关系，成为了中国发展、评价、定位外交关系的重要方式。

目前，根据外交部数据，中国已经和 51 个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伙伴关系不是一种变相的联盟，从目前中国的伙伴关系来看，仅有与 13 个国家的双边合约中出现了加强安全合作的内容，但没有一条涉及了“给予军事援助”的内容。伙伴关系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外交方式，它不仅不是新型同盟关系，反而是一种跳出联盟思维，寻求与广大国家在不同层次上加强合作的新型外交途径。

中国的伙伴关系是在为和平崛起而服务的。目前中国的伙伴关系分为战略伙伴关系、睦邻伙伴关系与基础性伙伴关系。多层次的伙伴关系使得中国可以与全球大部分国家与地区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对大国而言，战略伙伴关系可以更好地协调在国际大事上的立场；对周

边国家而言，睦邻伙伴关系可以进一步发挥临近的优势，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而对一般性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用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带动政治、文化多方面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有政治、安全矛盾的双方，伙伴关系的带动作用更加显著。

伙伴关系的全方位外交，与不结盟政策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这样的外交政策也表明中国早已脱离最初的意识形态、国际主义外交，而变为更加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尤其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往往遵循“因事而发，事终而止”的协作方式，不为了协调某些国际事务的立场而与他国建立特殊关系，依然坚持着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回到最初的问题，中国的不结盟政策是否还需要坚持？

笔者认为中国在当今依然需要奉行不结盟政策。

目前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和平崛起。而中国崛起的最大阻碍，似乎很明显，就是试图保持霸主地位的美国。

但 21 世纪与 20 世纪不一样，中国与苏联也不一样，如今的中美关系不能再延续冷战的对抗思维。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它的不断发展，不断前进是整个国际社会稳定的基础之一。中国要和平崛起，不意味着中美就要对抗。中国的发展不是为了对抗美国，更不是为了对抗任何国家。

中国的和平崛起面临着国际社会巨大的体系压力，一个新的超级大国的崛起是需要长时间的蓄力与忍耐的。不结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所承受的压力。在中国还没有实力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当下，盲目的联盟只会刺激美国，加强对中国及其盟友的遏制力度。更坏的可能性是许多国家被迫在中美之间进行选边，从而将中美关系变为集团间的对抗。中国早就认识到自己没有能力以自己为核心建立联盟，因此邓小平早已提出了中国“不抗旗、不当头”。

同时，不结盟政策的延续可以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态度也越来越重要。如果中国开始结盟，那么中国就需要更多地考虑与盟友立场的协调，照顾到更多的利益，无疑会增加许多成本，减少许多效率。这对于还在发展中的中国而言得不偿失。而保持不结盟，中国就可以从国家利益出发，坚持自己的原则，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内政外交。

此外，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增加使得传统的联盟效用正在减少。传统的联盟主要针对的是

军事进攻。而 21 世纪以来，恐怖主义、武器扩散、走私、海盗等安全问题得到了各国更多的重视。面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军事联盟显示出了许多缺点，已经很难发挥效用，而新型的安全合作方式却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如中国主导的上合组织，在中亚的反恐方面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中国完全可以寻求新型的安全合作方式，摆脱传统军事对抗的联盟形式。

因此，对目前的中国而言：结盟，没有这个需要，也没有这个必要。

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在目前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而来自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面对重重阻碍，笔者认为中国的外交不如在一定程度上无为而治，正如《倚天屠龙记》中所说：“他强任他强，清风抚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当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进一步完善，国内的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时，中国的崛起就会水到渠成了。

* 赵觉理是外交学院外交系的大三学生，他是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的总监。同时，他也是外交学院《外交青年》杂志社的社长。

法国对外贸易情况浅析及法中贸易形势展望

杨程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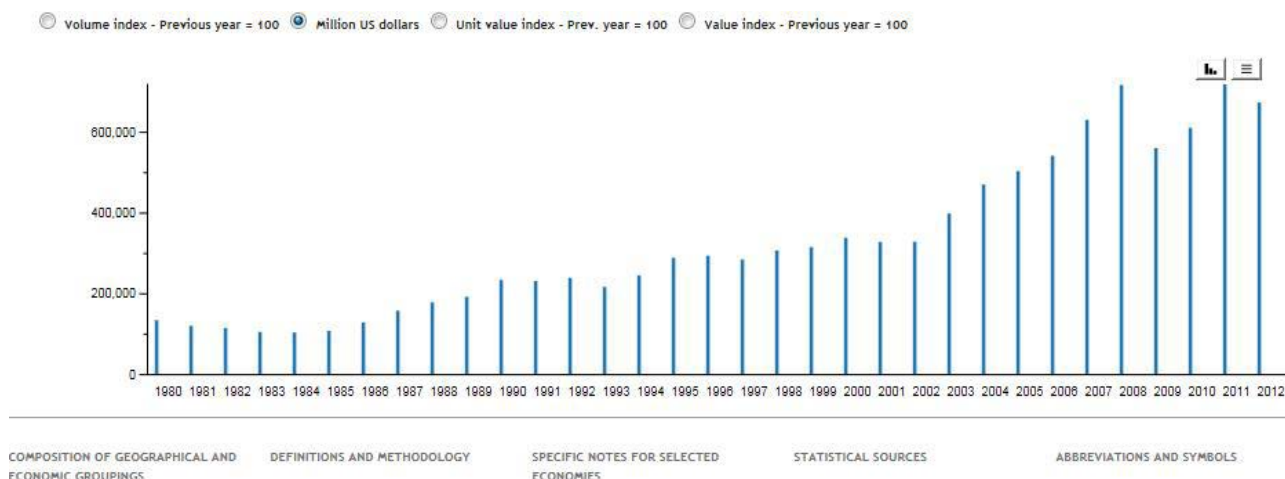
摘要：作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全球贸易大国之一，法国对外贸易在其国民经济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数据可判断出，近几年法国对外贸易的总体形势，贸易结构的调整，以及主要贸易伙伴关系的变化；本文根据 2009-2012 年的数据，对法国对外贸易的特点进行归纳，并就法国的外贸政策和法中贸易情况来展望今后双方贸易新形势。

关键词：法国 对外贸易 法中贸易形势

一、近年法国对外贸易概述

1、总体情况

作为西方七大工业国之一，世界第六大进出口国，法国近几年的对外贸易总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数据（图一），近几年法国对外贸易总额呈上升趋势，其中，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9 年的对外贸易总额下降为 1,401,6 亿美元；到了 2010、2011 年走势回升，分别为 1,498,7 亿美元和 1,731,7 亿美元，大致符合上升趋势。（如图一）



（图一）

在 2011 年的高速增长过后，2012 年法国对外贸易总体情况有所回落。出口贸易总额为 780,4 亿美元，较去年下降了 4.9%；进口贸易总额同比下降了 7.1%。全年对外贸易总额为 1,626,7 亿美元，跌幅为 6.1%，外贸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2.2%。2012 年出口总额占世界的份额的 3.09%，继中国，美国，德国，荷兰后排在第六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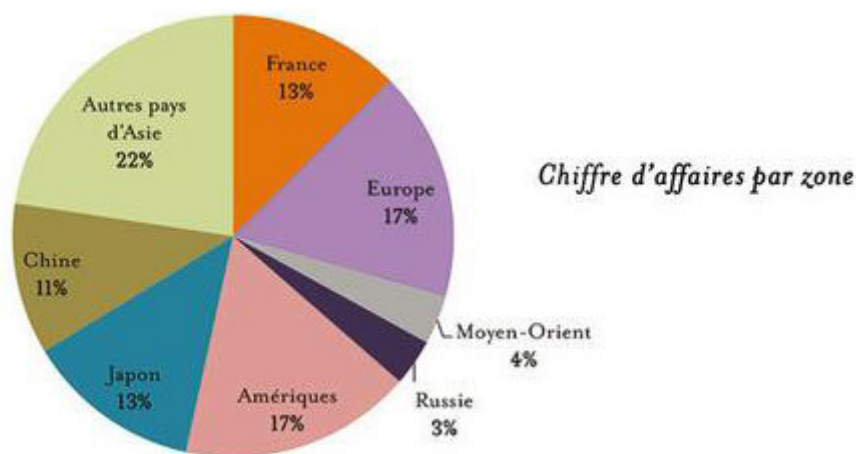
2、贸易结构

航空和航天器材制造是法国进出口第一大行业，2011年占对外出口商品份额的10.1%；2012年法国在此业务上实现强势增长，贸易顺差达203亿欧元，出口总额增长率达18.3%。

第二大主要进出口行业是农业产品和食品。法国拥有欧盟30%的可耕种土地，是欧盟最大粮食生产国，农产品生产国和农副产品出口国。2010年，农业产品出口占了对外出口商品份额的13.1%，2011年上升为14%；2012年，农业产品出口额仍然上升，出口额增长率2.3%。其中，酒类和奶酪等法国传统特色优势产业的出口业务增长明显，同时，初级农产品（如谷物）的出口下滑，精加工食品（肉类加工制品及奶制品）增长缓慢。

随着亚美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法国化工产业保持增长。2011年，化工产品产量与去年同比增长4.5%，对外出口份额为9.5%；其他工业半成品，如机械、金属制品，分别占出口份额的8.3%和7.9%，2012年则呈现下降的趋势。在冶金和金属制品进口业务方面，2012年法国也出现了6.5%的跌幅。总体来看工业半成品的进口在2012年有所收缩。

法国也是世界第四大汽车出口国，2011年汽车行业的出口占总出口的6.2%，2012年出现下滑，出口总额下降了5.1%。同时，成车和汽车零部件的进口在2012年的总量下降了2.4%。



(图二)

作为法国产业代表的奢侈品制造业，在2012年的出口总额保持快速增长。全年出口额占87%（如图二），其国内市场仅占13%。据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LVMH年报显示，2011年为23,659百万欧元¹；2012年达到28,108百万欧元，利润额5,921百万欧元，比上年增长12%。

¹ 以年报的统计单位为准

3、主要贸易伙伴

欧盟是法国最大贸易伙伴。其中，德国是法国最大贸易伙伴国。据 2012 年 WTO 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占其出口额的 60.9%（德国占 16.6%），美国占 5.6%，中国占 3.2%，瑞士占 3.1%，俄罗斯占 1.8%；进口额方面，欧盟占 58.9%（德国占 17%），中国占 8%，美国占 5.6%，俄罗斯占 2.8%，瑞士占 2.3%。

观察近几年法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情况可知，欧盟的进出口总额占法国对外贸易的份额均有所下降，2006 年为 61.2% 和 65.6%（58.9%，60.9%，2012）；而与此同时，与亚洲的贸易往来有所加强，就其与中国的贸易来说，2006 年，进出口份额占 5.7% 和 2.1%，到 2012 年，这个数字变为 8% 和 3.2%。

法国的贸易伙伴遍布世界各地。随着亚太等新兴市场的发展，对传统欧洲市场出口的弹性减弱，加强与亚洲、拉美等新兴地区贸易往来将是法国近几年对外贸易的重点。

二、法国对外贸易的特点

1、较开放的外贸政策和相对宽松的对外贸易环境

为了增加其对外贸易总量占世界市场份额，提升和巩固国际影响，法国采取了较开放的外贸政策。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法国在遵循欧盟共同贸易政策前提下，制定适应自身需求和发展的贸易法规。大体上，法国对外贸的管理采用间接的行政手段，并出台各种政策鼓励出口，减少海关对进出口的限制，提倡自由贸易。

在出口管理方面，一般商品都可以自由出口¹；在鼓励出口方面，政策规定出口企业经过审批后，可获得由银行以优惠利率提供的贷款；在关税方面，对出口货物实行零税率²是法国政府鼓励出口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政府宣传方面，鼓励企业出国办展、参展，改善本国产品的国际形象；在国际援助方面，通过对发展中国家³提供援助带动法国产品和技术设备出口；在产品标准方面，规范遵循欧共体 CE 标准，保证产品在欧洲市场的自由流通。

从 1958 年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到如今的欧洲联盟，法国都在其中扮演重要大国角色。在欧盟市场，成员国的产品、资本、劳动力和服务都可自由流通，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法国外贸的发展。地缘条件、区域经济、运输设施等都具有得天独厚优势的法国本身就造就了一个

¹ 法国政府实行鼓励出口政策，一般商品都可以自由出口，仅对少数产品施行出口管理，如对农产品的出口补贴管理和对军事装备、高技术产品和核技术设备的出口进行管理。（资料来自驻法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² 适用零税率的货物在任何环节都不用交纳增值税，即彻底免税。已纳税的，还可以退税。（资料来源同上）

³ 非洲法语区国家等

相对宽松的外贸环境。

2、近几年对外贸易赤字逐年上升到 2012 年有所收窄

自 2003 年出现外贸逆差以来，法国外贸赤字屡创新高，2011 年达到历史最高 89,877 百万美元。到了 2012 年，由于进口量的减少和航天制造业、农业产品和食品业以及奢侈品制造业出口量的快速增长，对外贸易逆差降为 659 亿美元，较 2011 年减少了 26.7%。出现此态势的原因可以归纳如下：

a) 金融危机后，欧洲市场经济疲软，市场需求量降低；法国自身经济恢复缓慢，而邻国德国外贸增长迅速，出口总额在 2010 年前 7 个月同比增长 18.5%（法国仅增长 9.8%）¹。面对邻国的竞争，作为老牌西方工业大国，法国在经济危机中出现的自身恢复力减弱，这导致了工业部门萎缩、生产成本过高、企业投资规模难以扩大、中小型企业生存困难等种种问题，使得法国产品在欧洲市场的份额减少，在其主要贸易伙伴的业务中形势严峻。

b) 在对新兴市场的出口方面，法国也没有占得先机。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并拥有庞大的消费人口和巨大的发展潜力。2006 年法国在亚洲出口所占比重为 8.8%，就法国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而言，对其市场占有率也远不及德国。非洲多数国家是法国的传统市场，现如今这块巨大市场受到来自美国、中国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在各国用贸易和提供贷款等方式增强其在非洲市场影响力的同时，法国企业还处在是否扩大其在非业务的踌躇中²。

c) 逆差的主要原因来自能源进口。法国能源自给率为 49.8%，99% 的石油、78% 的天然气，大量的煤、铁矿石和有色金属几乎全部依赖进口。2012 年，法国进口总量为 846.3 亿美元，其中能源产品进口占 19.5%，而出口仅出口总量的 7.2%。近几年国际能源价格的上下波动直接影响法国的对外贸易情况。其中，原油贸易占了相当大的部分。2012 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使得法国在化工制品进口业务的贸易逆差扩大，总额增加到 28 亿欧元。

d) 2012 年的逆差收窄主要因为出口量的扩大和部分进口业务萎缩。主要扩大了在航天制造业中对德国、俄国和亚洲地区的出口，医药制品行业对比利时、德国、美国的大量出口以及奢侈品制造业的出口份额刺激了法国出口贸易；在进口方面，由于需求量和交易价格下降，汽车及零部件、工业半成品和通讯电子设备行业进口业务萎缩，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2012 年的外贸逆差总额。

¹ 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

² “有能力的（法国）企业必须主动出击。它们必须加大在非洲的活动。非洲经济成长有刺激法国经济成长的潜力，法国不能在非洲缺席。”——法国财政部长皮埃尔·莫斯科维奇

3、调整外贸方向逐步向亚非地区等新兴靠近

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势崛起，不仅让西方老牌工业国家感到震惊，更让这些指挥国家机器运转的决策者们看到了新的市场，新的机遇。

其中的原因包括，随着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壁垒的减少和生产要素流动性增强，为各国涉外的经济活动发展提供了背景条件；金融危机等一系列经济重创，让发达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明显变缓，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外汇储备，在进入全球化经济过程中，新兴经济体进一步提高开放度，对国际事务参与性增强和更多话语权的掌握，是发达国家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接触的主要原因；

新兴经济体可挖掘的市场容量和潜在消费力，是发达经济体对亚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展开逐鹿之势的重要因素。

在充分认清世界形势，尤其是全球经济发展态势后，发达经济体积极调整外贸政策，抢占新兴市场份额。近年来，由于受各种经济、政治、社会民生因素影响的欧洲市场疲软，作为主要欧盟成员国之一，法国在对最大贸易伙伴的市场份额中逐渐缩水；法国政府调整外贸方向，重视将扩大对亚非、拉美国家出口作为拉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并自 2003 年起确定 25 个优先开拓的国家和地区，并把中国等五国作为最优先开拓的海外市场。

与此同时，法国政府也意识到执行这一政策的背后，是一条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和更多发展中国家崛起引起的全球贸易多样化、多边化，全球经济结构性转变以至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必然道路。

三、法中贸易形势

法中建交 49 年以来，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原则上的法中关系，在双方的不断的共同努力下取得巩固和发展。在贸易方面，双边合作不断加深扩宽——深化在传统的航空航天领域的合作，拓展在新兴能源、材料领域的技术交流——友好共赢的双边合作理念得到贯彻。

随着外贸方向的调整，法国逐渐扩大其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根据世贸组织 2012 年的数据统计显示，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 3.2%，中国目前已成为法国继欧盟和美国后第三大贸易伙伴。据法国媒体《回声报》报道，预测 2030 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法国第二大

贸易伙伴。

在双边贸易中，法国处于逆差地位。2012 年对华逆差达 346 亿美元，占其全年外贸赤字的约 40%。如此巨大的逆差使得法国政府一再呼吁推进两国在重点领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拓展新领域合作，扩大双边贸易，实现法中贸易再平衡。

就目前而言，提升两国贸易水平，扩大对华出口，一方面关键在于对华在能源、交通和通讯领域的技术型出口。而这也是将来进一步扩展法中贸易的有效途径。两国贸易平衡的先决条件是互补性的供求市场关系。基于双方经济体制结构和发展水平，了解双方市场的需求与偏好，更科学地决定贸易的重点与方向。法国在交通、能源方面的高技术有极强的竞争力，在中国市场份额中具有很大的拓展潜力。另外，传统行业如食品业的出口在中国尚未完全打开市场，有着极好的前景；加强法中两国在核领域的合作交流也是促进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体现。另一方面，加强两国政府对贸易的鼓励、保护和监管也是确保双方贸易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

法中两国在双边贸易中凝聚共识、加强协调是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前提，也是展望未来两国贸易形势的基础。两国都应共同在面对全球经济形势背景下制定并遵循互利共赢的双边贸易方案。全球经济形势在发展，通过贸易看到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并努力通过进一步增强信任及深化务实合作来适应和推动全球经济局势趋于平衡稳定，是双方外贸交流发展的主要方向。

参考资料：

- 1、<http://fr.mofcom.gov.cn/aarticle/ddfg/waimao/200203/20020300003066.html>
- 2、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statis_e.htm
- 3、徐龙善 . 欧洲经济问题浅析 .[J].Northern Economy and Trade, 2012(9) 12-13
- 4、商务部 .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 法国 .2012
- 5、LVMH Annual Report. 2012
- 6、2012 年法国对外贸易形势回顾 .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 杨程程是外交学院外语系的大二学生。她是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的干事。

Dans la région arctique, cherchons la solution des conflits régionaux sous la globalisation

Tong Hu

Aujourd'hui les moyens de transportation évoluent rapidement, le développement des technologies d'information et celui de communication poussent profondément la tendance de la globalisation en avant. Ainsi à l'égard d'économie, la globalisation économique apparaît plus évidente, qui concerne précisément le meilleur choix dans la main-d'œuvre globale, la circulation et l'échange globaux des biens de productions, la mise en opération du marché mondial dirigé principalement par les entreprises multinationales. Au même temps que tous ces actes renforcent la cohérence économique globale, la politique entre les pays sont influencée plus profondément et évidemment par les éléments d'économie. Pour la Chine, depuis la Réforme et l'Ouverture en 1978, les politiques diplomatiques servaient de tout cœur le développement de l'économie chinoise à l'intérieur du pays en se protégeant son environnement extérieur. Mais faisant face à la complexité née dans le changement des conditions objectives actuelles, le principe du travail de notre pays, comment évolue-t-il avec le temps, pour rester toujours stoïque devant les adversités et saisir la chance précieuse ? Laissons-nous jeter notre vue tout au nord, cherchons la solution des conflits régionaux sous la globalisation précisément dans la région Arctique.

Existant comme l'une des deux régions qui survivent proprement après le choc industriel des dernières époques, la Grande Arctique reste non seulement tant précieuse en recherches environnementales, mais aussi se trouve au sein des conflits frontaliers, de différents des ressources et de diverses voix sur la protection du système écologique fragile de cette Éden des scientifiques où il existe une immense quantité de ressources naturelles.

Actuellement, en envisageant les intérêts relatifs, les pays riverains qui poursuivent stablement leurs bénéfices directs, réfléchissent plus sérieusement sur ce grand gâteau délicieux, progressivement avec les états non-riverains qui obtiennent du droit indirect sur les affaires arctiques par une nouvelle nature du monde, la Globalisation,

concernant celle d'économie, de circulation et également la diversité de culture etc.

Laissons donc tourner notre vue au début:

Tout d'abord, à l'égard de sa définition géographique, elle concerne l'Océan Arctique, le Groenland, et des parties des sept pays comme le Canada, l'Alaska des États-Unis, la Russie, le Norvège, le Suède, la Finlande et l'Islande, également ce sont les états-membres du Conseil Arctique qui s'est déclamés comme les responsables principaux des affaires de cette région.

Pas de cause, pas de chose. Avec des chiffres qui nous expriment que la vitesse de la fonte des banquises a été considérablement élevée en 2007, une grande possibilité de l'ouverture des voies maritimes apparaît probablement en 2013, ainsi la circulation maritime compose principalement deux voies, dont l'une sera Nord-ouest qui aura le début de l'Europe occidentale et à la fois se terminera à l'Asie orientale en passant dans le cercle arctique, et une autre comme Nord-Est qui connectera l'Amérique occidentale et celle orientale. D'ailleurs, la souplesse de transportation dans cette zone permettra aux pays relatifs d'exploiter les ressources Bien Évidemment, cette fortune potentielle devient déjà une carte diplomatique importante pour les états riverains.

Sur ce point, en tant que pays non-riverain, la distance géographique entre la Chine et l'océan arctique ne doit pas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un obstacle de la participation chinoise dans cette région stratégique. En revanche, dans ce monde dont les partie s'associent plus profondément qu'avant, l'ouverture des voies maritimes élèveront non seulement les chiffres du commerce international et de la transportation, mais aussi cela causera l'augmentation du <<chiffre d'affaires>> du trafic international de drogues. Au même temps, la diffusion du terrorisme se cachant sous l'apparence des échanges multinationaux donneront probablement une inquiétude au bien des pays concernant la Chine.

Ainsi Au lieu de refuser l'aide des autres, ce sera dans la coopération que l'on élargira notre point commun et réalisera la résolution des difficultés de la géopolitique de cette région.

Donc basé sur le principe de régler objectivement les problèmes, il nous faut savoir que les pays riverains sont plus expérimentés pour affronter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et les situations inattendues, donc que de travailler avec l'aide des organisations régionales. Pourtant la Chine ne peut jamais éviter sa responsabilité et la céder aux autres, et en plus le moyen de devenir un pays d'observateur militaire dans le Conseil d'Arctique par exemple, nous propose une bonne idée pour la solution de ce problèmes plus en plus internationaux.

一路向北——北冰洋地区寻求全球性合作

交通工具的跨时代发展和信息通讯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全球化步伐在如今大步向前。由此，在经济层面表现出的经济全球化，即劳动力资源全球优化选择，生产资料全球流动与交换，由跨国公司参与并主导的世界市场化运作等，在极大地增强了全球经济相关性的同时，也使得经济因素对于国家间政治的影响更为重要和明显。在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政策的发展方针始终是：为国家内部经济发展谋求稳定的外部环境。这样的中心思想，在面对如今更加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格局时，该如何与时俱进？在未来五年里，中国该如何通过对自身的不断思考与改变来面对挑战，去抓住不可错失的机遇呢？

作为世界上经受了工业化冲击之后仅剩的两个污染指数极低的地方之一，北极地区是一个用于环境保护科研的绝佳场所，同时也是一个处在国土划界、不同资源争端等焦点上的地区。而对于这个科研与资源开发的“伊甸园”，与利益伴生的，对于这个极度脆弱的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对一些已产生的环境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也值得全人类注意与思考。

目前在北极地区，沿岸的国家（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挪威，芬兰，冰岛，瑞典，英国）因考虑到相关的经济、政治因素而在竞相追逐着各自的利益。而一些因为经济、交通以及文化多元化带来的“全球化”而间接受益的非沿岸国，也同样在思考如何面对这块“大蛋糕”。归本溯源，我们将视野移向北冰洋地缘政治问题的源头。

首先，由地理上的定义看来，北极地区包含了北冰洋，（冰岛管辖的）格陵兰岛以及加拿大、美国、俄罗斯、挪威、瑞典、芬兰等七国的部分地区，同样，这八个国家也组成了宣称对该地区事务有主要责任的“北极理事会”。

凡事皆出而有因。由2007统计出的关于北极地区冰盖融化速度不断攀升的一组数字看

来，一些新兴的水道极有可能在 2013 年得到开放。由此，在高纬度将西欧和东亚联系在一起的“西北水道”与将东亚、美洲西海岸和其东海岸在高纬度联系在一起的“东北水道”组成了北极地区的水道运输。显然，这个潜在的巨大财富已然成为了这些水道沿岸国握有的重要外交筹码。

在此节点，作为一个非沿岸国，中国和北冰洋地理上的距离不应被视作阻碍中国参与到该地区事务的障碍。而相反的，在世界各部分联系日趋紧密的当下，水道的开放不仅将会提高世界贸易额与世界运输量，也会增加世界性贩毒行为的“不法收入”。正值此时，或许会藏匿在跨国贸易往来下的恐怖主义的扩散，将会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心中悬起一块大石。

因而，只有合作，而不是拒绝他国的参与，才能不断增多国家间的共同利益点，成功解决该地区的地缘政治难题。

所以，基于客观解决问题的原则，我们需要认识到沿岸国家在面对该地区气候变化，应对突发情况上经验更加丰富。因此，北极地区的有关工作需建立在该地区的相关组织基础上。但中国也不能就此逃避在该地区的责任，甚至将其转嫁他人，反而可以谋求更进一步，比如通过成为北理会军事观察国这样的方法，为解决北极地区面对全球化冲击时产生的新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 胡同是外交学院外语系大一的学生，他是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的干事。

浅谈政治学背景下的模联学术问题

南开大学 左锦涛

在今年的泛渤海模拟联合国大会结束之后，我曾经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谈到了关于外交家与政治学家之间的区别，亦或者模联代表与政治学学生之间的区别，就如同厨师与营养学家之间的区别：

厨师（外交家或模联代表）凭借经验和手艺完成精美的菜品（外交成果），但是他们本人可能根本没有学习过什么营养学（政治学理论）；营养学家（政治学家或学生）通过经验资料建构起对食物营养（政治活动）的理论，但是他们本人可能对于烹饪（外交活动）并不精通。这个比喻实际上表达了我的一种见解：在模联或者说模拟外交的学术当中，存在着作为“艺术”的政治和作为“技术”的政治这样两种分野。

先谈谈作为“艺术”的政治。“政治是一门艺术”，类似的表述已经被无数哲人和政治家诠释和实践过了。可以说，一个伟大的外交和政治成功，或者一场成功的模联会议，恰如一件赏心悦目的艺术品：富有想象力，巧妙利用了约束条件，不可能被复制……

那么，在模联学术中，作为“艺术”的政治素养应当如何修习呢？首先我必须说，由于每个人的天赋存在差异，故而并非人人能够最终拥有相当的“政治艺术”素养。正如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艺术家，还是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他们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超乎常人的天赋之特质：坚忍、冷静、领导力、想象力、创造力、洞察力，甚至是偏执、残忍、野心……所以我认为，作为“艺术”的政治素养有着天定的一面，对于模联代表来说就是，自身一些与生俱来的特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自己能够在模联道路上走多远。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这些普通人不可能拥有这样的素养了呢？也不尽然。这就要谈到作为“艺术”的政治的另一面，即经验的一面。在现实次元中，伟大的政治家们无不有着曲折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政治活动经验，而这往往是他们拥有超人能力的关键。透过对以往经历和经验的总结，他们往往能够获得一种准确的直觉，确定恰当的目标，透过它来把握外交和政治活动的细微变化和内在联系，并巧妙运用它们。那么映射到模联活动中，对于十几二十岁的模联代表来说，相对应的就是参会经历和经验，以及对于外交政治历史的认识和把握了。在参会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基础上，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代表也可以培养出类似的直觉，从而有效利用手中的资源和会议的局势，达成恰当的目标。（这里我是反对阴谋论的，关于反对阴谋论的问题，欢迎大家另辟话题共同探讨）这也就是我所认同的模联中的“政治艺术”了。

谈到这里，我要说作为“艺术”的政治确实不是我的长项，所以接下来也不详谈了。下面是我所擅长的话题，也是我们这些“中人之资”的人最有可能做出名堂的领域，作为“技术”的政治。这一点我在我的一条状态中谈过，技术的特点是可重复操作、无意识形态色彩以及相对确定性。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模联中的“政治技术”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姑且称之为“知识类技术”，顾名思义，就是对于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比如法学知识、经济学知识、军事知识，亦或者日本、美国、非洲、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概况。第二种姑且称之为“方法技术”，这主要是指各种用以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的科学方法，比如政治制度研究方法、政策分析方法、政治过程研究方法、比较政治方法、政治经济学方法、历史方法乃至博弈论等。

为什么这些最有可能做出名堂呢？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只要肯下工夫肯努力，你肯定会成为以上某项或者几项技术的“专家”。对于知识类技术来说，需要的是有计划和针对性的阅读和收集资料，以及适当的思考消化，这其实也并不困难，只要长期关注这个领域就好。比如对欧盟感兴趣，就从欧盟的政治经济制度相关书籍读起，并且关注相关的新闻就好。对于方法论技术来说，除了对基础知识的积累外，还需要对所习方法的充分理解以及更多的实践，从而真正将“方法”变成自己分析问题的一种“习惯”。

从目前来看，知识性技术的普及程度是最高的。“姿势水平”毕竟是可以靠看书看资料积累起来，只要每天、甚至每周花点时间看看计划好的书，关注一下新闻就能够做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难度较高，方法在模联中的普及程度很低。而我认为，如果将模联视作一种公民教育，那么思维训练、尤其是思维方法的训练，便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其中将方法论变得通俗易懂，便于高中生和非社科专业的大学生学习和运用，就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那就是我曾经提出，现在倡导的一个概念，叫做“政治学与模联学术共同体”。这其实非常容易理解，就是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与模联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在学术方面相互合作，共享学术研究成果。

就目前来看，随着一批高中模联人升入大学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专业中，以及一批大学政治学学生投身模联活动中，一个无组织、松散的政治学 - 模联学术圈子正在逐渐成型。这些具有双重身份的模联人和政治学人，尚未充分发挥出“学术共同体”的力量。而我相信它，并且我也倡导，逐渐建立这样一个共同体，探索“方法论通俗化”这样的命题，以及政治学与模联更多的创新。

* 左锦涛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大三的学生。



Vol.03, 2013.12
CFAUMUNA Presents